

· 内部刊物 ·

西北历史资料

1985

1

(总12期)

目 录

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驱鞬人来华·····	王宗维 (1)
丝绸之路东段的另一支线——青海路·····	周伟洲 (11)
唐代的文川道·····	李之勤 (27)
《马可波罗游记》和春秋时期的秦晋韩原之战·····	李之勤 (37)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西安·····	李健超 (41)
1869年以前英国对东土耳其斯坦的政策	
····· (英) G. J. 阿尔德著 董志勇选译	(48)
关于修改《伊犁条约》谈判的俄方文件选译·····	李步月译 (67)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一九八五年五月

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

王宗维

(一)

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这不仅从大批出土文物可以得到证明，文献方面也有记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以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西巡为线索，把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对西域状况的了解集中表述出来。周穆王西巡，确有其事。《竹书纪年》记：“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见西王母。”慎于治史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秦本纪》中也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问题在于周穆王西巡最后到达何处，有人以为仅仅到达河西走廊，有人说到达塔里木河流域，有人以为到达波斯，有人以为到达今撒马尔罕，有人以为到达阿拉伯半岛，也有人说到达今锡尔河中游，这些都难以肯定，但无论如何，到达今敦煌以西天山以南地区，这是不成问题的。书中所记并非全是周穆王的见闻，而是把后人的许多传说故事编入其中了。

在此书成书前后的另一部著作《山海经》，也是一部传说集。其中关于西山经、西海经部分，收录了当时人们对西方山川人物的传说。书中虽然有许多荒诞离奇的内容无法令人相信，但不乏真实的史实，它同样保留了春秋战国以前中原人与西域各地交往中得到的许多知识。还有《管子》、《淮南子》等书，也有关于西方的一些记述，亦可证明中原与西域已有交往关系。

西方国家的历史著作记载了西方人探索东西交通的活动。著名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记载了公元前六世纪阿利司铁阿斯（Aristeas）从欧洲向中亚旅行的过程，他确实到达中亚地区。克提斯阿斯（Ctesias）是希腊人，曾在波斯供职，他所说的“赛里斯”（Seres），意为“丝国”，无疑是指中国。这说明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已经知道东方中国是盛产丝绸的国家，西方人也见到了中国的丝绸。

不过，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在中西交通路线上分布着无数个民族政权，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互不隶属，语言也是各不相同，要想从东到西走通这条路线还是十分困难的。当时的各种联系交往，或者是通过许多民族地区中辗转进行，或者是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把文化由此地带到彼处，不能进行正常的商业交往，也没有专门的商路和商队。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后来一直到西汉武帝时开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

公元前二世纪，汉朝政府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先后两次。据黄文弼先生的说法，第一次是公元前139—126年，第二次是前119—115年^①。出使的目的是联络月氏、乌孙，以制匈奴。

这时，西汉的西北疆界，大致以黄河为限，黄河以东是汉朝的陇西、北地二郡，以西则为匈奴、氏羌。是时正是匈奴国家的极盛时期，它与汉朝的北方、西北为邻，对汉朝形成严重威胁。

匈奴国家的行政管辖区分三部，即单于王庭直属部（中部）和左方（东）王将部、右方（西）王将部。“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②威胁汉朝西北地区的主要是右方王将的右贤王、右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等都是单于所在的挛鞮氏部贵族集团担任。挛鞮氏又与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等四大贵族结为婚姻集团，形成匈奴国家的最高统治阶层。按照分布，呼衍氏居左方、须卜氏和兰氏居右方，匈奴西方的贵族部落为须卜氏和兰氏^③。

张骞出使西域前，须卜氏占有今兰州西北的永登东部和景泰县等广大地区。须卜部即《史记·骠骑列传》中的速濮部，后来霍去病曾击败该部^④。须卜部以西，则为匈奴统治下的休屠部、浑邪部、解得部和今酒泉地区的小月氏部等，小月氏也是匈奴统治下的奴隶部落。早在西汉文帝三年（前177）后，匈奴右贤王大举进攻河西，赶走统治这个地区的月氏部，势力扩张到罗布泊以西的楼兰。简言之，张骞西行前，陇西郡以西直至天山南北，都为匈奴贵族统治，张骞要在匈奴统治地区行走数千里。

公元前139年，张骞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从长安出发，西行出陇西郡，大约在今靖远县一带渡河，即为匈奴须卜部首领俘虏，送至单于庭^⑤。张骞被匈奴单于拘留十余年之久，后乘机与甘父等人逃出，西行，经河西走廊北侧、腾格里沙漠南缘，到达天山南部地区。当时车师地区为匈奴控制，车师后国以西为乌孙占据，张骞的报告中未提到车师、乌孙的情况，说明他没有从天山以北行走，而是从天山南麓“走数十日至大宛”^⑥。

大宛当今费尔干盆地，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为葱岭以西的第一大国。《大宛列传》记：“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说明大宛对汉朝早有了解，并报以极友善的态度。大宛知道汉朝的情况，无疑是从月氏、乌孙等国而来。月氏从河西走廊迁居于大宛之西，不过二十多年，而且就是经大宛地方向西迁移的。乌孙迁居大宛以北，时间更晚，它是把先住在这里的月氏人赶走而占有赤谷山地区的。大宛与月氏、乌孙是近邻，月氏、乌孙原先又是秦汉王朝的近邻，他们可以把中原地区物产富饶的情况告诉给大宛人。

张骞在大宛受到热情接待，又在大宛王的支持和帮助下从大宛都城贵山城（Kasan）出发，沿锡尔河以北到达锡尔河下游的康居。张骞不直接西通月氏，而绕道康居，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康居为“行国，与月氏大同俗”，都是游牧国家；二是康居“国小，南羁事月氏”^⑦，和月氏有某种隶属关系，大宛王大概是想通过这种原因使张骞与月氏接上关

系，完成其出使的目的。张骞到达康居，又在康居王的支持下折而南下，过锡尔河，经撒马尔罕地区到达月氏王城。据《大宛列传》记：“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妫水北”，妫水即今阿姆河。又据《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记：“大月氏国王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二曰双靡翎侯，治双靡城；三曰贵霜翎侯，治护澡城；四曰聿顿翎侯，治薄茅城；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监氏城岑仲勉认为白鸟库吉解释为铁门(Termed, Termez)是对的，并说“实为白鸟之卓见”⑧。这样，五翎侯所在，就在铁门周围。

张骞在大月氏没有说服大月氏王东返与汉共击匈奴，就从监氏城南下，越过阿姆河到达大夏国。大夏国原在阿姆河以北，都监氏城，因遭月氏的攻击，举部南迁，臣属大月氏。张骞到达大夏以后，又逆阿姆河东返，越过葱岭，经于阗、罗布泊回朝。《大宛列传》记：“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这无疑是张骞耳闻目睹的记录。

这次出使是中国政府派遣的第一批使臣深入中亚地区。张骞及其随行人员历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四国，在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活动达一年有余，了解了该地区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道路里程，物产生活等，掌握了第一手的重要资料，这就为汉朝政府进一步发展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联系提供了可靠依据。

张骞第二次出使的目标是乌孙，目的是争取乌孙，使之“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改变“河西地空”的局面⑨，共同对抗匈奴。浑邪故地在汉张掖郡，最初的张掖郡治所不在后来的临泽县，而在武威郡的张掖县，具体地点在今武威西与永昌交界处。

此时的乌孙都城据《汉书·地理志》在赤谷城，当今纳林河上游伊什提克附近，辖境东与乌贪訾离国（今乌鲁木齐西）接⑩，南临姑墨（今阿克苏）⑪、温宿（今乌什）⑫、龟兹（库车）⑬。温宿至乌孙赤谷为六百一十里⑭。西包伊犁河、楚河流域，与康居国在今塔什干以东接壤。从上引温宿至乌孙赤谷城的里程看，汉使至乌孙的路线，约相当贾耽《四夷道里记》所记由温宿州至乌孙治所赤山城的道路。

张骞到乌孙，劝乌孙昆莫东返河西走廊的目的没有达到，即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这次出使带着大队人马，“所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资金币帛直数千巨万”⑮，除留赠乌孙者以外，各副使所带人马财物仍然不少，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次出使除前次所到的四国外，又增加了条枝、身毒，路线又向西向南发展了。张骞在乌孙停留不久，在乌孙响导的引导下与乌孙所派的使者数十人返回长安，各副使也与所至诸国的使臣到汉朝报谢，从此，西域许多国家开始和汉朝发生了正式的接触。后来，汉朝的使臣还到了奄蔡、犁靬等国，活动于里海和黑海以南地区。当时汉朝和西域各国的来往十分频繁。《大宛列传》记“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中西交往进入空前高潮。

(三)

西汉政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张骞第一次出使回国之后，就积极筹备和着手从事中西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建设。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汉朝派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一次是经陇西过黄河，北逾乌逆水，败匈奴须卜部，西上到焉支山（今山丹东大黄山），然后沿原路而返；二次是深入居延、酒泉。这两次出兵，击败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统治势力，彻底清除了阻碍中西交通发展的严重障碍，不仅酒泉以东的匈奴各部归附汉朝，就是整个盐泽东（今罗布泊）也出现了“空无匈奴”^{①⑥}的局面，这就为中西方的来往提供了很大方便。张骞第二次出使往返，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安全经过河西走廊，再没有发生被匈奴俘虏的事件。

就在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期间，汉朝政府在黄河东岸建筑起第一个城堡，这就是后来的金城（今兰州西）。《史记·骠骑列传》记：“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使，即驰传以闻。”这个时间为前121年秋季，“将城”即修筑城池，“河上”指黄河岸上。当时汉朝政府在黄河岸上修筑的城镇只有金城，后来成为金城县治所，除此之外，别无相应之城镇。可以断定李息修筑的城就是金城。金城的修建，使汉朝政府在通往河西的天险黄河岸上有了重要的据点，有力地抵抗匈奴残部的扰害。两年以后，汉朝又陆续在河的对岸即令居地区实行移民屯田，拱卫金城。

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在黄河金城的对岸修起另一城堡，即令居塞。令居塞的位置，据《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条记：“令居，涧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有人以为涧水是乌逆水（今庄浪河），也有人说涧水当浩门水（今大通河），这些都不正确，《地理志》对此两条水的走向都有明确记载，不能混为一谈。涧水实即今庄浪河以东的小咸水。涧水从令居县西南流过入郑伯津（即通向金城的渡口），则令居塞城就在小咸水的东北，位于金城通往河西走廊的大道上。霍去病渡过乌逆水败须卜部匈奴，就经过这里；两次从河西回师也经过这里，所以这里是通河西的要塞，汉朝在此修筑城塞是必要的。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有“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可见工程之浩大。

令居塞的工程完成后，建筑工程继续向西，史称“始筑令居以西”，直达酒泉^{①⑦}，由酒泉“以通西北国”^{①⑧}。《史记》、《汉书》在此记“初置酒泉郡”之说，当为追述之辞，未见得可取，而《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瓚语：“筑塞西至酒泉”，是符合事实的。当时酒泉移民不多，不具备置郡条件，为了通西域，从令居起塞延伸至酒泉，以保障道路的畅通，则完全属实。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汉朝就把交通路线的建设一直延伸至酒泉。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朝把交通路线的建设又推向玉门。当时中西来往的人数日渐增多，仅汉朝使西域者一年多则十余起，少者五六起，每次达数百人，这对沿路各国的烦扰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当道的楼兰、姑师等国。这些国家不堪其烦扰，对汉朝的使者采取对抗态度，拒绝供应食物。汉朝政府没有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派赵破奴、王恢

等出兵攻楼兰、姑师等国，迫使其屈服。赵破奴等回军途中，又降服了酒泉以西的小月氏右且王部和鞬鞞王部^{①9}，解除了酒泉西部小月氏人对行旅的阻扰，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此玉门不是后来敦煌以西的玉门，而在今玉门县一带^{②0}。

公元前104年（汉太初元年）李广利伐大宛，中途败师而归，驻玉门以西之敦煌地界，汉武帝派人“遮玉门关”^{②1}，不让李广利入关。在此期间，汉朝政府和李广利之间来往联系十分频繁，汉朝还要从酒泉等地运送粮饷至敦煌，于是从玉门到敦煌之间驿站、亭塞相继建起，前102年（太初三年），汉朝的交通设施已延至敦煌。

李广利征大宛之后，汉朝在西域的影响更大，于是西域各国“多遣使来贡献”^{②2}，汉朝也“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②3}，中西交往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大概在公元前100年（天汉元年），汉朝在敦煌县置酒泉都尉，“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②4}。至此，汉朝在河西走廊的交通路线全部疏通，交通设施基本齐备，就等待着继续向西发展了。从前121年修筑金城，到前100年亭塞修到罗布泊一带，汉朝政府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些工程的完成，为行人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证。

接着又向西发展，深入天山以南之渠犁、轮台。

早在公元前105年以前，大宛人对盐泽附近的交通险阻形势作过分析。当时汉武帝闻大宛贰师城有善马，派“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大宛群臣以为“汉去我远”，中隔盐泽，“出其北，有胡（匈奴）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②5}大宛统治集团就以此处道路艰难，汉朝无可奈何，拒绝给汉朝卖马。可见盐泽附近交通十分困难。

前104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与赵始成、王恢等前往大宛买马。他们在盐泽以东因有足够的装备顺利通过，但是一过盐泽，就迂到给养上的困难，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及至大宛东郁成，数万人仅剩数千，而且饥饿不堪，不得不退回敦煌^{②6}，士卒仅存什一二。前102年，汉朝再次攻大宛，就吸取前次之教训，以“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多赍粮”，“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②7}。汉朝政府虽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用这样多的人力物力向西域运送粮食，实在太困难了。就在这次战争期间，汉朝征调了十八万人在河西走廊开荒种地，生产粮食；战争结束后，又在渠犁、轮台设置使者校尉，各有田卒数百人，种植粮食，“以给使外国者”^{②8}。渠犁、轮台屯田，大概始于公元前100——98年。

公元前90年（汉征和中）前后，汉朝在渠犁、轮台的屯田初具规模，汉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②9}

桑弘羊的这篇奏文，内容极为丰富。当时渠犁、轮台虽置屯田，吏卒各数百人，但轮台以东的捷枝、渠犁仍有大批可耕之良田，加之气温适宜，水草丰足，可修筑渠道，广开屯田。屯田步骤先由田卒开种，一年有积谷，即可招募健壮和家有负担的农民移居耕种，不

断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收入。为了保证屯田的安全，一方面从轮台以东增置三校尉，分管各区，同时再由张掖、酒泉派出斥候与屯田校尉联系，一有惊报，就立即向河西报告，随时派兵救援。在此区域内，逐步设置亭障，相互呼应，既可便于行旅，又可及时传递消息。此类亭障可一直向西推进，与乌孙紧密联系起来。奏文很有分寸，仅言“稍筑列亭”，意思是不像盐泽以东亭、塞林立，而是根据西域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量力而为。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则盐泽以西至乌孙的交通设施就可设立起来。但是，此时汉朝连年进行战争，国力衰竭，汉武帝不愿再“扰劳天下”^⑩，激起人民的不满，所以没有立即批准执行。

至汉昭帝即位，又用桑弘羊的建议，在轮台扩大屯田。不过昭帝没有直接派兵前往，而是利用在汉京城居住的抒弥太子赖丹“将军田轮台”。抒弥国在今于田东，赖丹曾为质于龟兹，李广利过龟兹时带入京城。赖丹在长安近二十年期间已经熟悉汉朝的制度，汉朝就以其为校尉佩汉朝印绶前往，在轮台以东直至渠犁实行屯耕。后来因龟兹国王的干扰，成效不大。

公元前68（汉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带领一批人马在渠犁屯田积谷，后郑吉奉命护鄯善以西南道^⑪，此南道包括由鄯善经渠犁、轮台、龟兹至乌孙、大宛之北路，和由鄯善经抒弥、玉田、疏勒以通大宛之南路，实际行使对天山以南各国的行政管辖权。郑吉护鄯善以西南道，对进一步促进沿路诸国交通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西边日逐王先贤禅欲降汉，使人先告郑吉，郑吉即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往车师迎接，并送至京师。汉从右部日逐王手中得到车师，领有今吐鲁番周围之地，开辟了由盐泽经车师到轮台的道路，时称北道，郑吉亦由护南道进而“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称都护”^⑫。都护的设立，是汉朝经营西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与此同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解除，汉朝政府可以放手经营西域了。《汉书·西域传》记：此时，“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汉）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所设在渠犁与轮台之间的乌垒城，位于西域中心，且可借渠犁、轮台屯田之力，加强对西域的统治。

西域都护设置后，都护及其下属充分行使着对各国的管辖权：为了履行职责，都护及下属官员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都护治所与各国之间的距离、京都长安与各国之间的里程，均详细载于典籍。如《汉书·西域传》记：

鄯善，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去都护治所乌垒城一千一百三十八里^⑬。

乌垒，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渠犁，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

龟兹，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闾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闾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

大月氏，王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有五翎侯：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翎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翎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牂顿翎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西与条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西与犁鞞、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临西海。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都善而（西）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点，转北而东得安息。

根据以上所记，汉朝的使臣从长安出发，经玉门、阳关，计行六千三百里，即达西域最东之国婁羌。由婁羌西行，经渠犁，行九百三十八里，即达汉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乌垒西行三百五十里至龟兹。龟兹西南行达疏勒，疏勒距乌垒城为二千二百一十里。疏勒西行，则可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宛距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属都护；康居去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虽不属都护，但西域都护可随时至其地观察动静。这些国家通汉都长安和西域都护府所在乌垒的里程记载得如此清楚，说明当时已经形成固定的路线，沿路有驿传等设施。

大宛以西诸国不属都护，但《西域传》仍记载着详细路线里程。大月氏与汉朝交往密切，汉朝不仅掌握通往大月氏都城的里程，还详细记载了到该国五翎侯治所的具体距离，说明往返人数很多。安息当波斯地区，汉武帝遣使至安息，其王派兵迎于东界，由东界过数十城，行数千里始到王都。安息和乌弋山离国之西则有条支、犁鞞等国，这些国家临西海，即今日之地中海地区，《西域传》不记里程，仅言“行可百余日”，说明没有固定路线，但道路可以通行。

总之，汉朝开发和经营西域的结果，不仅统一了大宛以东地区，将它们置于西域都护管辖之下，结束了政权林立，各自为政，争战不息的局面，而且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东西通道，使原有的区段交通线联系起来，形成了从长安直达中亚的交通大道。上面所说的仅仅是一条干线。实际上，汉使出玉门关、阳关，就有南道、北道，北道可绕乌孙、康居到达安息、条枝等国，南道又可经身毒、大夏、乌弋山离等国到达安息、条枝等国。这些道路的开辟，大大便利了中西交通的往来，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

西汉时汉朝官员所到的最西地区，据史书记载，当为骊靬，来中国的使臣、行人，也以骊靬人最为遥远。

汉朝使臣到达骊靬的时间，约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以后，其国人亦于此时随汉使来到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塞），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靬、条枝、身毒国。”汉始筑令居起塞至酒泉，在元鼎六年，遣使至安息、奄蔡、骊靬、条枝，当在此后不久。

骊靬的方位和通骊靬的路线，《汉书·西域传》略有记载：

“乌弋山离国……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枝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条枝国）临西海……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枝接。”

根据以上记载，骊靬、条枝在乌弋山离国西，亦在安息以西。上书又记：“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知安息当在乌弋山离国东北。《史记·大宛列传》记：“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种稻……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由此可知，条枝在安息国西数千里，临西海，即滨地中海，而安息役属之，说明此时条枝处于安息统治之下。

安息即后来的波斯，条枝即西方史中的塞流息咨王朝。

塞流息咨王朝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形成的一个强国。塞流息咨王朝以它丰富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使国家富强起来，并长期掌握着东通波斯、大夏、粟特、印度贸易大道的控制权，西与地中海东部诸国有频繁的贸易关系。塞流息咨王国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的国家，各有独特的语言、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公元前二世纪时，这个国家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王朝开始衰落。公元前138—129年，安条卡斯七世·西德特在位，企图重新恢复塞流息咨强国，东征安息，结果全军覆没，其国东部地区或者归属安息，或自行独立，从此塞流息咨王国只剩下滨地中海的叙利亚、凯勒叙利亚等一部分领土，政治统治瘫痪。《史记》和《汉书》的条枝条下记“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正反映了塞流息咨王国失败后受安息统治的这种情况。

骊靬位置应在条枝西北。《大宛列传》安息、条枝均有专条，而不列骊靬。《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条记西与犁靬条枝接，从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而不载到犁靬的距离。安息条记武帝时安息“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犬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证明骊靬与安息相邻，此时成为安息的属部。证之条枝国条下记“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诸语，可知骊靬是一种民族，以其善于幻术著名，先是臣属条枝（塞流息咨王朝），条枝衰亡后，其一部分人又成为安息的属部。安息极盛

时的疆域，西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则骊靬人大概就在此西北。西汉武帝时汉朝使臣所到的骊靬，就在两河流域的西北方。

公元前二世纪末至一世纪初，罗马国家的势力向东扩张，先后吞并了比提利亚、本都王国，并于公元前64年前后消灭了塞流息忒王朝的最后势力，将其并入罗马的领土，从此罗马与安息就以两河流域为界，安息役属下的骊靬人大部成为罗马的属民，罗马设立行省统治之。自此以后，汉朝政府与骊靬的关系，实际上就成了与罗马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以后，汉朝与罗马就开始发生了正式交往。《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即罗马，汉朝人先是同骊靬人发生关系，从罗马统治骊靬后，汉朝又是通过骊靬与罗马政府接触，所以就产生了大秦又名骊靬的说法。这种不确切的说法，大概和东汉永元九年（97）甘英出使地中海地区返回的报告有关。

骊靬人来中国，至晚从武帝元鼎年间已经开始。《大宛列传》说：“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汉使第一次至安息，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所派的副使，返回时间在元鼎三、四年，安息献犁靬眩人，亦应在此时。由于汉武帝喜欢犁靬眩人的幻术表演，并令汉人仿效，此风更甚。《大宛列传》记“及加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正义》释：“加其眩者之工，言汉人幻人工妙，更加于犁靬”。说明骊靬眩人不但把幻术传入中国，而且汉朝迅速将这种幻术发展、提高，成为风行一时的伎艺。这种眩人幻术，根据注释家的解释，相当于当今之魔术。《史记索隐》引韦昭注：“眩人，变化惑人也。”《魏略》云：“黎靬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汉书·张骞传》应劭注：“眩，相诈惑也。”颜师古注：“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通典》还记武帝时安息国所献犁靬幻人的体貌特征是“蹙眉、峭鼻、乱发、拳须”。这种特征，同《大宛列传》所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有所不同。

由于骊靬幻人到中国受到汉朝政府的重视，所以后来陆续来中国者不少。西汉时张掖郡下辖骊靬县，《汉书·张骞传》犁靬条下颜师古注：“犁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又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声，无定字。”骊靬的读音，颜师古注：“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由此可以说明，骊靬县的得名，与犁靬人有关。他们随西域各国使臣来汉，有的在河西待诏，不能返里，寄居在河西。因为他们善于幻术，所以远道来此寄居的西域各国人都被称为骊靬人，晋时称骊靬戎。汉朝政府为了进行管理，于其地设骊靬县。骊靬县见于《汉书·地理志》，更多的见于居延汉简中，大概在武帝后昭帝时，即有此县。骊靬人定居于河西，有的到达长安，虽然人数不多，但它说明西汉时汉朝已经和罗马东部辖境的骊靬人有着交往，骊靬幻术在汉朝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注 释:

- ① 《西北史地论丛·张骞使西域路线考》。
- ② 《汉书·匈奴传》上。
- ③ 《后汉书·南匈奴传》。
- ④ 参见拙作《霍去病祁连山之战》，载《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 ⑤ 参见拙作《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载《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 ⑥ 《史记·大宛列传》。
- ⑦ 《史记·大宛列传》。
- ⑧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大月氏节。
- ⑨ 《史记·大宛列传》。
- ⑩ 《汉书·西域传》“乌菆訾离国”条。
- ⑪ 《汉书·西域传》“姑墨”条。
- ⑫ 《汉书·西域传》“温宿”条。
- ⑬ 《汉书·西域传》“龟兹”条。
- ⑭ 《汉书·西域传》“温宿”条。
- ⑮ 《史记·大宛列传》。
- ⑯ 《史记·大宛列传》。
- ⑰ 《汉书·西域传》。
- ⑱ 《史记·大宛列传》。
- ⑲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书·武帝功臣表》。
- ⑳ 《辛卯侍行记》载：“赤金营堡……汉玉门县地”。此玉门即原玉门关所在，以后关址西移，在此置县。
- ㉑ 《汉书·张骞传》。
- ㉒ 《汉书·西域传》。
- ㉓ 《史记·大宛列传》。
- ㉔ 《汉书·西域传》。
- ㉕ 《史记·大宛列传》。
- ㉖ 《汉书·李广利传》。
- ㉗ 《史记·大宛列传》。
- ㉘ 《汉书·西域传》。
- ㉙ 《汉书·西域传》“渠犁”条。
- ㉚ 《汉书·西域传》“渠犁”条。
- ㉛ 《汉书·郑吉传》，《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条。
- ㉜ 《汉书·郑吉传》，《汉书·西域传》。
- ㉝ 楼兰去阳关千六百里，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丝绸之路东段的另一支——青海路

周 伟 洲

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段是在中国境内，主要的交通道路是经由今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故人们称之为“河西路”。从中国文献正式记载的公元前一三八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出使西域始，到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都是经由河西路。甚至到今天，河西路仍然是沟通中西方陆路交通的主要道路。可是，丝路之东段的河西路并不是唯一的一条通道，还有与之大致平行的几条通路。其中就有本文所要论述的“青海路”。所谓“青海路”就是从中国陕西的西安（古称长安）到甘肃的陇西后，不走河西走廊，而走今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入新疆的通路。关于青海路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外学者均有所论述，①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青海路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

一、汉至十六国时期青海地区的交通概况

从远古时代起，青海地区就是我国古代羌族所居之地。汉代以前，羌族与中原地区有过密切的交往。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其西界“至临洮（今甘肃岷县）、羌中，”②“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③当时秦北方的强敌匈奴，早已击走了居于河西走廊的月氏，匈奴休屠王、浑邪王部据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之地，与羌交通。至汉武帝时，“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西），列西（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④至此，中原内地经河西走廊入西域的河西路开始兴盛起来。而从武帝开河西、列四郡的目的之一，是“隔绝南羌、月氏”等情况看，河西走廊之南的青海地区的羌族与北面蒙古草原的匈奴之间，是有着频繁的交往的。⑤它们之间来往的道路，应是横切河西走廊，从居延海（今内蒙额济纳旗）北上。因此，从青海横切河西走廊，经居延海，到北方蒙古草原的道路，至少在战国时就已经存在。居延也是中西交通一个重要的枢纽。从居延海向西，经马宗山至西域，这条道路也是丝绸之路东段一条著名的支线，称为“居延路”。

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从酒泉、武威分置张掖、敦煌二郡的前后，汉军西逐羌族，渡黄河、湟水，筑令居塞（今甘肃永登西北）。当时，居住在大榆谷（今青海贵德附近）的先零羌等联合诸羌，“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南），遂围枹罕（今甘肃临夏）。后为汉将军李息击破，汉始设护羌校尉，以统羌族。此时羌族迁至西海（今青海湖）、盐池（今青海茶卡盐池）一带。⑥于是，汉朝于元始六年（公元前81年）设金城郡，统治湟水流域，最西之地达湟水源上的临羌县（今青海湟源）。⑦到西汉末王莽时（公元5年），莽“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

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⑧这样，青海北部就正式归于汉朝的管辖之下。从此，从内地经过金城（今甘肃兰州西），沿湟水至青海的道路，就成为内地与青海地区联系的主要干线。

至于从青海一带向东南进入四川的道路，据文献记载，开辟也甚早。《后汉书·西羌传》云：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西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

赐支，又作折支，指黄河上游河曲一带，是西羌的主要根据地。据上文，知秦献公时（公元前384——前361年），居住在赐支河曲的羌族有几支南下，一支到今四川大渡河西，汉代越嶲郡内，称牦牛种，越嶲羌；一支迁到今四川广汉西北，汉广汉郡西北，称白马种，广汉羌；一支迁到今甘肃成县以西，汉武都郡西，称参狼种，武都羌。也就是说，约在公元前三百多年，青海赐支河西的羌族就曾多次从东南方向进入四川。他们所经过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条。大致是从洮水而上，经临洮，再从羌水（今白龙江支流）下武都，入四川。或由河曲经临洮，至今松潘，沿岷江而下，入蜀。据解放前曾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进行民族调查的马长寿先生收集的当地羌族端公（巫师）的《太平经》（即“车经”）记：当地羌族传说其始祖车几葛布，是从赐支河曲，经岷江上流迁到该地的。迁徙的时间，大约是在汉代之前。⑨

从以上的分析，知在秦汉时期青海地区与内地的主要交通道路均已形成。主要的道路有向北、向东、向东南方向的三条。至于从青海湟水流域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入西域的青海路，则不见于记载。不过，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条道路可能与河西路一样，也早在秦汉时就已存在。三十多年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根据青海湟水流域出土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推测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至新疆，是一条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⑩青海羌族聚居之地，秦汉时其西直接与新疆东面的“若羌”相接。这两部分羌族之间应该是有交往的，他们交往所通过的道路就应是青海路。⑪但是，这都是一些推测，青海路是否早在新石器时代或秦汉时已存在，还需要以后大量出土的文物资料来证实。

以上青海与内地的交通道路，以及与河西路、居延路相接的情况，一直继续到五世纪初东晋十六国时期。其间中国内地与西域交通的主要干线，仍然是经过河西走廊的河西路。这条道路虽然因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时有断绝，⑫但它始终作为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干线，担负着中西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如三国时，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就说到，有匈奴婢（匈奴称之为“货”），其中包括大胡（西域胡）、丁零和杂有羌，亡匿在河西走廊北，“常为西州道路患”。又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⑬又如西晋末年据河西的前凉张氏，曾遣“沙州刺史杨宣，率众疆理西域”。⑭十六国时期，一度统一了北方的前秦苻氏，曾遣吕光伐西域，吕光的进军路线及从西域返回河西的路线，均经河西走廊的河西路。⑮还有从印度、克什米尔、新疆等地经河西路到内地的僧人，如鸠摩罗什，《高僧传》卷六《释道融传》内所述的师子国（今锡兰）的婆罗门及佛陀耶舍，县无谿等。⑯从中原内地入西方求法的僧人法显、智猛、县无竭等。⑰其中法显

及县无竭入西域的道路，与传统的河西路稍异，值得特别提出。

据现存的僧佑《出三藏记集》著录的《佛游天竺记》一卷（即《佛国记》），^{①⑧}记载了法显入天竺（印度）的行程，中外学者考证甚多。夏鼎先生对法显所走的这一段行程考证颇精，云其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度过陇山，“由靖远（即所谓“乾归国”所都的苑川，^{①⑨}经兰州、西宁（“僭擅国”所都的西平），西北行度越养楼山至张掖，并不经过海西走廊的东段乌鞘岭和武威。”^{②⑩}法显为什么要采取向西宁然后北至张掖这条道路呢？我想，是否是因南凉秃发氏据湟水流域，建都于今西宁（后又迁乐都），使这里的经济、文化和交通都有所发展，作为求法僧人的法显为了求法或弘法，所以采取了这条路线。

关于县无竭，《高僧传》卷三《释县无竭传》记：

释县无竭……姓李，幽州黄龙人。……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

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县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旛盖供养之具，发迹此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

法显出发的时间是宋永初元年（420年），出发地点不详。从其为幽州黄龙人看，可能是从河南或关中一带出发，度陇山，“初至河南国”。此“河南国”，过去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即指北魏，^{②①}有人说是吐谷浑。^{②②}夏鼎先生以为指西秦乞伏氏，此说为确。因西秦乞伏乾归及其子炽磐均称“河南王”，且西秦灭于四三〇年，因而决不会是指北魏。而吐谷浑当时还没有自称或被封为河南王，故不得称“河南国”。^{②③}当时乞伏炽磐还健在（死于427年），其国都仍为苑川。“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此海西郡当为西海郡之误，这已为前人所指正。此西海郡并非如夏先生所说，是王莽时于青海附近所设之西海郡，而应是指自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置于居延海的西海郡。^{②④}因王莽于青海所置之西海郡，早已废弃，而居延的西海郡自东汉设置后，西晋、前凉、西凉、北凉均因之。此地是秦汉以来著名的居延路的要冲，从居延向西，则可达高昌。如此，县无竭所走的这段路程，是从苑川、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后北沿弱水至居延（西海郡），再向西沿居延路至高昌。所以，事实上法显、县无竭西行的路线仍然是以前早已兴盛的河西路或居延路。

二、南北朝至隋初青海路的兴盛

到南北朝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北魏逐渐统一了北方，与南方汉族政权对峙；在漠北蒙古草原也兴起了一个强盛的政权柔然（又称作“蠕蠕”、“芮芮”、“茹茹”等），与北魏相对峙；在青海和河西等地建国的西秦、北凉先后为吐谷浑、北魏所灭，吐谷浑则兴起于甘南、青海之地，统治了原有的羌、氏等族。在这种形势下，处于南方的各政权与蒙古草原的柔然，青海、甘南的吐谷浑等，均企图相互联合共抗北魏。而南方政权力图打通与西域的交通，以与西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往。但是，从南方向漠北和西方的两条主要道路（即河西路、居延路）皆为强敌北魏所阻断，于是南朝西北蜀地经吐谷浑所控制的青海路就势必兴盛起来。

早在宋景平元年（423年），据河西的北凉沮渠氏及其南的吐谷浑阿豺就开始向刘宋遣

使朝贡,并接受宋的封号。以后,双方均不断地互派使臣。^{②5}至四二八年前后,柔然的使者开始出现在刘宋的建康(今江苏南京)。^{②6}柔然至少在大檀在位时(423年左右),势力就达今新疆伊吾(今新疆哈密)一带。因此,柔然至宋的使臣应是从居延或蒙古草原南下,经盟国北凉的酒泉、张掖,再经吐谷浑的浇河(今青海贵德),沿西顿山北麓至龙涸(今四川松潘),再顺岷江入蜀。上述北凉、吐谷浑也均由此道后一段遣使至宋的。^{②7}

公元四三九年(北魏太延五年),魏灭北凉沮渠氏,河西王沮渠牧犍弟无讳、安周西奔鄯善(今新疆若羌),于四四一年袭据高昌之地(今新疆吐鲁番),重建北凉政权。次年,无讳遣常侍 汜儁 奉表至刘宋。^{②8}汜儁从高昌是经过什么道路抵达健康的呢?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因敦煌以东已为北魏所占领,汜儁走的路当由敦煌南下柴达木盆地,通过吐谷浑入益州,东下建康。^{②9}这是青海路的一条支线,下面我们还要详加论述。以后,北凉小政权又多次遣使至南朝,此时北魏已据有整个河西,北凉使者再也不能走汜儁走过的路,只能从高昌南下到鄯善,然后向东越今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控制下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走青海路,经龙涸入蜀至建康。^{③0}

与此同时,又见文献记载有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魏太武帝遣高凉王那击吐谷浑慕利延一事。此事《魏书·世祖纪下》,同书《吐谷浑传》、《天象志》、《西域传》等均有记述,其中以《世祖纪下》记载最详,兹引如下:

(八月)壬寅,高凉王那军到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瓌世子被囊逆军拒战,那击破之,被囊轻骑遁走,中山公杜丰精骑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什归及炽磐子成龙,送于京师。慕利延遂西入于阗国。

曼头城,在曼头山,按《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河源郡下注云:“置在古赤水城。有曼头城、积石山,河所出。有七乌海。”则曼头城当在积石山北,今青海共和县治南。慕利延是从青海湖南到其根据地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③1};所渡之流沙,当为今青海都兰以西柴达木盆地之沙碛。另一支由原吐谷浑西秦王慕瓌世子被囊等所领的军队为魏军击败后,从都兰西北,“度三危,至雪山”。按《通鉴》卷一二四引此,下胡注云:“郿道元曰:三危山在煌敦县南”。又《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敦煌县云:“三危山在县南三十里。”同书瓜州晋昌县(今甘肃安而东南)云:“雪山在县南一百六十里,积雪夏不消。东南九十里,南连吐谷浑。”如此,则被囊等从柴达木盆地西北上,先至敦煌县南之三危山,又向东南至雪山,为魏军所擒获。这条通过敦煌南入青海的道路,就正是上述汜儁走过的青海路另一分道。而慕利延则渡流沙,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③2}即是说,他是由曼头城,经白兰,沿柴达木盆地向西,从且末至于阗的。这条道路就是青海路。

为什么青海路会在五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兴盛呢?原来北魏统一中原后,并没有及时打通河西,恢复与西域的交通。原因主要是:最初“经营中原,未暇四表”,后又畏柔然的抄略。至魏太延元年(435年),魏太武帝才遣王恩生出使西域,恩生至流沙(在今新疆哈密附近)即为柔然所执。接着,北魏又遣使二十六辈使西域,董宛一行最后到达了西域乌孙(今巴尔喀什湖东南)诸国。当时北凉还未灭亡,只是名义上臣属于北魏,北魏出使西域的使者均由沮渠牧犍送至姑臧(今甘肃武威),发使导路,出于流沙。但北凉阴与柔然相

结，常阻北魏使者，^{③③}故北魏于四三九灭年北凉，又于四四五年遣成周公万度归平鄯善，四四八年拜交阯公韩仗^{③④}为“鄯善王”，“赋役其人，比之郡县”。^{③⑤}至此，北魏经过多年的努力开通了由河西走廊通西域的干线，西域及中亚等地各国使者源源不断地由此路到达北魏。可是，北魏控制鄯善的时间不长，至五一八年宋云一行经过鄯善时，此地已为吐谷浑所据。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北魏在鄯善势力的衰落，可以追逆到四四五年慕利延西入于阗之后。^{③⑥}

这样，青海路之兴盛，至少为以下几个主要的因素所促成：（1）处于南方的刘宋为了打通与西方的交通，避开占据河西走廊的北魏；（2）北魏虽控制了河西走廊，但由此至西域的要冲——鄯善、高昌等先后为北凉、柔然、吐谷浑及后来的高车国所控制；（3）吐谷浑占领青海，并将势力向西扩展到鄯善、且末；他既与北魏，又与刘宋通使，均受其册封。基于以上三个主要的因素，使青海路得以逐渐兴盛起来。

自五世纪四十年代后，史籍所载往来于青海路的使者、僧人颇多。如《高僧传》卷一二《释慧览传》云：

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还至于阗，复以戒法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即慕利延）世子琮等敬览德闻，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

此云慧览由于阗至吐谷浑（河南），再由吐谷浑至蜀。据此，可推测他经由的路线，应为由于阗北上至且末或鄯善，东入柴达木盆地的白兰，再由青海湖南顺洮水至龙洞，沿岷江而下，至成都。惟慧览自于阗经吐谷浑的年代不详，按上文云慧览至吐谷浑时，慕利延还未死去，慕利延死于宋元嘉廿九年（452年）。^{③⑦}故此事当在四四五——四五二年之间。

宋元徽三年（475年），又有释法献从宋之金陵（即建康）入西域求法。据《高僧传》卷十四《释法献传》记：“释法献姓徐，西海延水人……以宋元徽三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绝，遂于于阗反。”河南，即指吐谷浑。这样，法献由吐谷浑至柔然（芮芮）走的哪条路呢？松田寿男先生以为，法献既为西海郡（居延）延水人，芮芮又在北方蒙古草原，故法献为了返回故乡西海，取道北上，经居延入芮芮，然后由芮芮境入高昌，南下至于阗。^{③⑧}这一推测基本可信。这说明青海路虽已兴盛，但原来的河西路、居延路并没有断绝。这一时期内，西域及中亚等国的使者仍从此两路不断到北魏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即是明证。

可是，当时的青海路也是很兴盛的。北魏神龟元年（518年），有北魏宋云、惠生一行赴西域的路线，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证。据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云：宋云一行“初发京师（洛阳），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土谷浑城左右煖于余处。……从土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土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土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③⑨}赤岭，即《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所记之赤岭，地在今青海西宁西的日月山，从日月山向西行至吐谷浑城。此城法国沙畹认为在今青海布喀音噶尔沿岸。^{④⑩}按宋云一行经吐谷浑时，吐谷浑王为